

# 歷史文化名城、建築空間表徵與文化觀光

## 論西安大唐芙蓉園的空間生產

殷寶寧

真理大學人文與資訊學系

ning@mail.au.edu.tw

### 摘要

1980 年代起，改革開放的中國，積極追求經濟發展的腳步與國內各地的文化旅遊發展，及建立城市競爭力的關係密不可分。「文物保護」工作因經濟條件改善獲得關注，「歷史名城」在文物保護政策實踐下，同時，具備了改善城市居住環境條件、城市景觀與進步意涵、推動觀光與促進投資等特性，藉由販售文化觀光之體驗經濟，「歷史名城」既渴望具備現代化都市的進步意涵，亦欲建構其文化自明性的表徵，故整體都市空間結構與建築形式，儼然成為爭逐都市空間意義的主要戰場。

本文以中國歷史名城西安之文化觀光開發重點「曲江新區」的發展經驗為經，其開發區內主題公園「大唐芙蓉園」為緯，探討在文化全球化的趨勢下，意圖藉由深厚歷史文化資源，以觀光產業為發展策略，同時取得區域經濟成長與城市開發的中國，如何操弄建築空間表徵與大唐皇城之文化象徵符號，以期在文化觀光與文化資產保護均能取得文化霸權的發展模式。

關鍵字：西安、文化觀光、文化資產、文化霸權、大唐芙蓉園

論文引用：殷寶寧（2011）。歷史文化名城、建築空間表徵與文化觀光：論西安大唐芙蓉園的空間生產。

*設計學報*，16（2），23-44。

### 一、前言

「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幾乎可謂為「旅遊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tourism）之代名詞。全球各地區與城市莫不積極以「文化」作為包裝與行銷自身的工具和手段，此趨勢在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與社會歷史條件各異的脈絡下，展現為結合城市行銷、文化資產保存或文化創業產業等不同的發展模式。

1980 年代起，中國各地文化旅遊產業的發展，與其積極追求經濟發展、城市競爭力的軌跡密不可分。因追求經濟成長，以及經濟條件改善與「文物保護」工作相應地獲得關注，「歷史文化名城」在文物保護政策的實踐下，雖以文化保存為首要目標，卻同時具備了改善城市居住環境條件、城市景觀與進步意涵、推動觀光與促進投資等特性；藉由販售文化觀光之體驗經濟，「歷史文化名城」欲藉由文化保存實踐建構其文化的自明性表徵，亦渴望具備現代化都市的進步意涵，故整體都市空間結構與建築形式表徵，儼然

成為爭逐都市空間意義的主要戰場。

對比於歐洲城市紛紛致力於發展文化觀光，以替代衰退的製造業，並取得其在人類文明發展歷程上的優性，正崛起之中國高度經濟成長率與文化觀光產業的發展，卻在同一個時間軸上同步擴張。亦即，歐洲歷史城市文化觀光的另類發展模式係架構在工業革命以降，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從工業化大量生產，歷經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等生產方式的轉變，放置在從社會主義急速轉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社會，其論點是否具有有效性？這一提問構成本研究的第一個探討動機與起點。

相對於，三十年前便開始「販賣祖產」的英國社會，在中國，為了追求「遲來的」現代化，各個城市發展其文化旅遊戰略時，除了要宣示自身文化的價值，以此來販售文化旅遊與文化產業商品及服務，也肩負了經由此投資開發的資金投入，進行城市實質環境的改造、提昇市民生活品質的重責大任，並在意識型態層次方面，建構出強勢文化血統的集體記憶。展示自身（的文化）、也在鏡像中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此一推展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經濟開發與建設過程，伴隨中國社會的急速都市化與土地炒作，在「都市化」等於「現代化」、等於「進步」的論題中，文化與觀光產業形同兩面刃，既宣稱了文化方面的優勢地位，也對內取得了都市超限開發的正當性。此一從土地、空間、城市到文化一氣商品化的巨大結構，似乎已經一面倒地完全任由資本邏輯作主。那麼，在此巨大結構中，擔負建築與空間文化形式的關鍵生產者之建築與環境專業者，又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如何回應此類課題成為文化全球化發展趨勢下，設計專業者不得不面對與思索的處境，此課題構成本研究第二個研究動機與企圖。

西安為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亦為重要的觀光旅遊城市之一。西安城牆為明朝初年以唐長安城皇城為基礎建造而來，不僅是中國現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古城牆，是中國國務院於 1961 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此刻正積極申請世界遺產登錄；改革開放後，其都市發展模式建構出以重新塑造唐代鼎盛時期，作為建構城市文化認同之符號與空間表徵。故在都市主要空間範圍內，特別是西安古城內主要公共建築，以改造為唐式建築風格為尚；從歷史名城與文物保護到新興都市開發，致力追求「大唐盛世」光榮為其空間發展策略。「文化觀光」則設定為塑造唐式皇城格局的體驗，其中，大雁塔東側的「大唐芙蓉園」主題公園為典型結合了都市土地開發、舊城區改造、文化觀光產業與都市行銷等面向之代表案例，故本研究以此作為切入分析前述課題之個案，企圖藉此個案，觀察中國西安發展經驗可能的獨特性，以作為設計專業者在文化全球化發展脈絡下，企圖以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與批判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的主張，回應不同地區、城市或國家文化發展困境時的可能出路。

本研究採取之研究方法，包含：實地觀察、文化資料收集與訪談三種途徑。除文獻收集外，2008、2009 年暑假兩度造訪西安市與大唐芙蓉園，並於 2009 年 8 月訪談大唐芙蓉園的總設計師張錦秋建築師。在資料應用方面，由於相關開發商的訪談難以取得，該部分資料主要以文獻來補足。

## 二、分析架構：從觀光凝視到文化霸權建構

本研究企圖以大唐芙蓉園之空間生產個案，探討西安文化觀光與空間生產的關係，釐清文化觀光與意識形態作用的關係，及設計者在此過程中的作用與扮演的角色。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文化觀光」（cultural tourism）定義為：「一種與文化環境、包括：景觀、視覺、表演藝術和其他特殊地區生活形態、傳統價值、事件活動，和其他具創造和文化交流過程的一種旅遊活動。」「文化觀光」強調個人經由實地參訪的體驗與消費等行為，而與異文化產生對話與交流。澳洲學者莫絲卡朵，彙整多位研究者對文化旅遊及遺產旅遊之定義，將其總結為：「文化與遺產旅遊

是一種參與者嘗試學習、體驗自身及他人當前和過往文化的旅遊形式。」(Moscardo, 2001, p. 4) 此旅遊者體驗的取向，強調經過一個選擇的過程，遊客透過與特定場所之互動，及其自身的詮釋，獲取文化或遺產的經驗和空間意義。此體驗過程牽涉了符號經濟 (symbolic economy)。然而，「文化資產」並不一定等同於觀光消費的對象；文化資產會被「客體化」(objected) 為觀光凝視 (gazed) 的對象物 (object) 乃是經過了一個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 的過程。

馬坎納 (Dean MacCannell) 在《觀光客》(The tourist; MacCannell, 1999) 一書中提出，觀光吸引力 (a tourist attraction) 來自於觀光客 (tourist)、景觀 (sight) 與提供物 (marker) 之間的實證關係。馬坎納所稱的「提供物」，指的是包含：宣傳品、文宣折頁、旅遊書等傳遞旅遊資訊的中介物；在此一組關係中，重要的是，提供作為觀光客參訪的「對象」，即所謂的「景觀」，並非是自然、天生的，而是經歷過一個「變成」(becoming) 的過程，其意義會因所在的時空而不同。例如，英國的嬉皮 (hippies) 在英國國內可能是境內其他地區的觀光客，但也可能成為其他想一窺嬉皮次文化觀光客眼中的「景觀」。另一方面，由於有「提供物」此一資訊傳遞的中介，觀光客不必擔心不知道看什麼，因為在觀光的社會實踐系統，自有其生產出觀光景觀的機制。即使遠在世界不同角落，透過觀光提供物的溝通，人們清楚知道，到羅浮宮美術館一定要參觀蒙娜麗莎畫像。「到羅浮宮觀看蒙娜麗莎畫像」此一跨越國界的高度共識，一方面來自於觀光體制化機制的「景觀視覺神聖化」(sight sacralization)，另一方面，則是觀光客對觀光行為的儀式性態度所致。馬坎納借用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日常生活儀式性的理論，來解釋觀光客的行為，並以此說明觀光在現代社會中，如何制度化成為一種相對於日常生活常規外的儀式性活動 (MacCannell, 1999, pp. 41-43)。

爾瑞借用馬坎納對觀光吸引力組成結構的分析，更進一步引伸，並特別著重於觀光活動進展，其系統性的運作，及在此動態過程中，各個作用者之間的關聯與作用。爾瑞主張，「觀光」(tourism) 為一整套具社會意義組織化行為，而自成一個完整的體系 (Urry, 2002)。「觀光」行為的成立與發生，來自於特定社會內部一整套，包含：「觀光產業」、「觀光地點」、「觀光行為」的論述與實踐。爾瑞提出「觀光客凝視」的概念，以此來詮釋觀光活動過程中，從事觀光活動的「凝視主體」(gazer)，與「凝視對象」(gaze) 兩者間，所涉入一套持續且有系統的社會關係與實體關係。如此一組關係是由許多專業人士有意或無意安排出來的，包含：攝影師、旅遊作家、旅遊指南作者、地方議會議員、文物產業專家、旅行社、旅館業者、設計師、旅行從業人員、電視旅遊節目、觀光旅遊局官員、建築師、城市規劃者，觀光旅遊學者等。因為觀光活動的進行，有賴於各式各樣的社會習慣與論述，也仰賴於讓一個地方或場所，看起來像是個可供觀光的「樣子」。延伸馬坎納「觀光客、景觀與提供物」三者之間關係的討論架構，爾瑞直言，當今所有觀光旅遊市場各式各樣的「名勝」，都是由此類專業技術、符號與組織方面的各種論述所聯合建構出來的 (Urry, 2002, pp. 248-249)。

在馬坎納的論題中，觀光客、景觀與提供物三者關係架構模型，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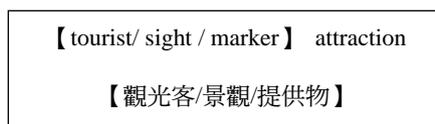


圖 1. 馬坎納觀光吸引力架構圖 (資料來源：MacCannell, 1999, p. 41)

以此模型來分析觀光過程，觀光客與其所凝視的景觀間關係較為靜態。爾瑞的架構欲在觀光客與其所凝視的景觀間，建立起較為動態的分析架構。延伸此命題，本研究試圖對其彼此間關係更為細緻地分析，以釐清不同行動者 (agents) 所可能發揮的作用。

首先，針對觀光客、景觀兩者應屬於相互建構的關係，不僅是將景觀作為被動的客體，供觀光客參訪遊賞，觀光客與景觀之間有凝視與觀看的關係，而觀光客也透過景觀來重新自我建構其主體邊界。原本「提供物」此一較為靜態的概念，轉化為可作為分析景觀提供端之動態生產關係，即觀光景觀之提供者，故將其圖示改繪為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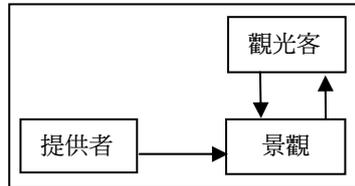


圖 2. 觀光客、景觀與提供者關係架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其次，針對景觀的提供端，事實上，一個地方、地景或城市，之所以構成可供觀看、凝視的觀光景觀，必然牽涉了觀光的提供者，此提供者可再區分為：資源分配與決策層面、專業執行層面，以及開發商等三類重要的作用者。資源分配與決策部分包含機構依各地區或城市等決策模式而異，亦可能涵蓋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國土規劃、區域規劃、都市計畫、觀光與土地開發、文化資產保護與文化產業主管機構等的行政與立法部門。至於，專業服務層面則囊括了包含建築設計者、都市規劃師、環境景觀規劃、文化資產維護與保存、文化資產經營管理，以及從上游到下游龐大的觀光產業部門等，均可歸結為提供專業服務的領域，開發商指涉提供龐大金錢或土地資本作為觀光產業開發之作用者，但也可能與觀光產業的某些環節相互重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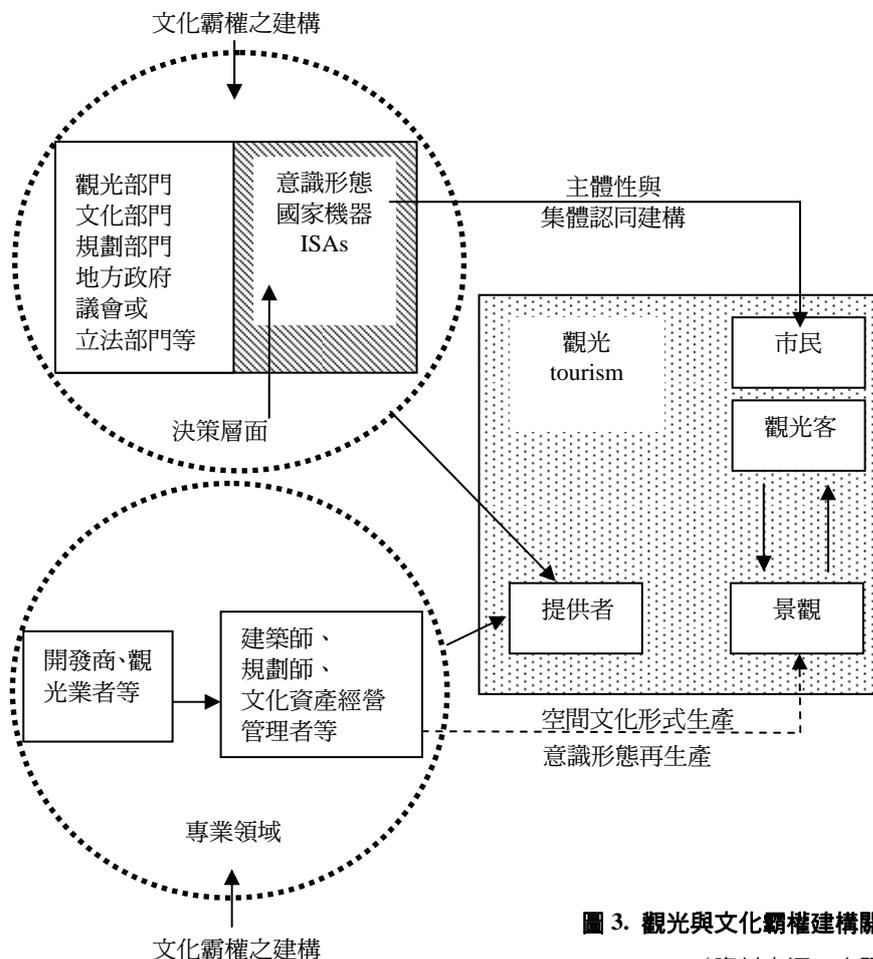


圖 3. 觀光與文化霸權建構關係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再以圖 3 來分析，原本僅由提供者、觀光客與景觀三者之間構成的觀光系統，事實上，在都市空間或特定環境場域，其當地市民或居住者也是相關服務設施的使用者，而將原本設定觀光客屬於特定社會之外來人群的定義擴大了。從觀光提供者的角度來看，牽涉從中央到地方的國家機器所制定與觀光產業發展相關的決策或立法，應可歸結為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提出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ISAs)之一環(Althusser, 1971)，透過作用者在文化觀光行為經驗，同時，對內對外具有主體性與集體認同建構的意涵。

專業服務領域的作用者為構成觀光景觀空間文化形式的關鍵生產者，亦即是意識形態再生產的建構者，而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力量，共同構成了文化霸權的作用力量。此分析架構圖的左半邊，為本研究所欲探討之範疇，即關注文化全球化、產業化的發展趨勢下，共同架構起一個地方、城市或區域文化，及其建築與空間美學的可能影響因素的作用過程，以及專業者如何回應此空間生產的社會動態歷程。

針對本研究個案，以下列四個面向切入分析：1.西安整體城市空間結構引導向觀光產業的政策與執行過程；2.在此執行過程，援用、引入資本主義土地開發模式而逐步衍生出的開發集團，及結合開發與地方政府之權力集團，對大唐芙蓉園空間生產的想像與建構；3.建築設計者對大唐芙蓉園開發的歷史文化想像，反映在以歷史為觀光賣點之主題公園的設計思維、及其設計自主性、對開發商的回應等面向。4.主題樂園空間生產的再現及其意象等。

### 三、西安觀光城市發展與開發歷程：

#### 以曲江新區決策層面分析為核心

西安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城市及區域規劃發展歷程，大約可分為幾個階段與相關影響因素：1.開放初期，觀光旅遊業與其他產業並行，輔以文物保護措施以作為觀光景觀的客體。2.1992年，中國提出「國家旅遊度假區」方案，西安仿此規格優先以地方政府力量進行國家級觀光度假區開發。3.1990年代至2000年初期，以所謂曲江模式進行都市大規模開發、更新、整建，以文化觀光城市作為發展策略藍圖。4.2005年後，轉向文化產業開發模式，並以此逐步擴大其開發集團規模，成為影響都市開發最為巨大的力量。茲以各階段過程說明如下：

#### 3-1 從觀光到文化產業的城市發展戰略

##### 1. 1980年代初期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觀光發展

1980年代因快速的經濟開發建設，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在城市規劃與建設過程，造成城市歷史文化遺產的破壞，中國國務院於1982年批准了包含北京、西安在內第一批的歷史文化名城，成為中國文化保存體制的一環，也是促進城市往文化觀光產業發展的推力(張松，2008)。

繼1950年代計畫經濟時代的第一次總體規劃後，於1980年提出「1980-2000年西安城市總體規劃」。此階段採取計畫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的模式，確立繼承和發展唐長安棋盤式路網和軸線對稱的布局特點，選擇以新區圍繞舊城發展的結構模式，而保持古都風貌，發展旅遊業作為支柱產業之一提升到應有的戰略高度，意圖藉由旅遊產業的規劃對文物保護起推動作用，例如，將文物古蹟和遺址改為遺址公園的作法，既保護文化資產，亦可作為考古研究和旅遊觀光、認識歷史的場域(和紅星，2002，頁49-50)，為下一階段積極結合旅遊產業與文化資產保存奠下政策與專業論述基礎。

## 2. 從國家旅遊度假區計畫到設置「西安曲江旅遊度假區」

中國自 1980 年代改革開放、積極從各層面追求經濟發展；進行觀光旅遊事業的開發亦為其中重要一環。1992 年，為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吸引國外遊客、開發中國豐富的旅遊資源，促進中國旅遊觀光型態向觀光度假型轉變，加速旅遊事業發展，國務院提出「國家旅遊度假區」試辦計畫，針對符合國際度假旅遊要求、以接待海外旅遊者為主的綜合性旅遊區，鼓勵外國和台灣、香港澳門地區的企業、個人投資開發旅遊設施、經營旅遊項目，實行優惠政策，屬國家級的開發計畫區。國務院批准包含江蘇太湖、上海橫沙島等 12 處國家旅遊度假區<sup>1</sup>。

以西安城市總體規劃為政策工具基礎，並延續國家整體政策方向，陝西省人民政府於 1993 年向國家旅遊局備案，仿照國務院的國家級「國家旅遊度假區」計畫，於西安市設置「西安曲江旅遊度假區」，以省級旅遊度假區，由中央政府賦予其省級開發區管理權限和優惠政策。

在執行的制度設計方面，其執行機關是以西安市政府成立的派出機構「曲江新區管理委員會」負責曲江新區開發；曲江新區範圍內，主管市級的經濟管理許可權、計畫審查、規劃、建設管理、土地出讓與企業管理等事項，其目的在於為投資者提供高效率服務，加速開發效率。為更靈活進行開發與資金取得，相對於管理委員會，另設曲江新區發展有限公司，負責開發區內基礎建設、規劃建設和融資工作。

2003 年 7 月，「西安曲江旅遊度假區」經西安市政府批准，更名為「曲江新區」，原有管理權限和優惠政策沿襲不變。「曲江新區」開發工作從 1996 年啟動，初期規劃面積為：15.88 平方公里。長期規劃面積為：47 平方公里。在西安市行政區中屬於雁塔區，此區域目前仍保有大量文化資產，包含四處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大雁塔、青龍寺、杜陵、唐長安城遺址；三個陝西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秦二世陵、曲江池遺址、唐城牆遺址；四個國家 4A 級景區：大慈恩寺-大雁塔文化休閒景區、大唐芙蓉園、曲江海洋世界。因西安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其城市開發歷程與曲江新區的開發機制密切相關。

曲江新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同時也是當時的西安市副市長段先念，2005 年於西安市政府進行的建設報告指出，曲江新區設立的依據和目的有四：除前述國務院試辦國家級旅遊度假區、陝西省政府提出的省級國家旅遊區，填補了國家級旅遊度假區多位於沿海都市、缺乏內陸據點的現況；提升西安整體旅遊產業兩項外，最重要的第四項目的在於：「完善城市功能的要求。按照國務院批准的西安市總體規劃，在曲江地區建設旅遊度假區是為了滿足城市人民日益豐富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亦即，開發的策略與企圖明確地是以旅遊產業建設力量，帶動都市化的進展。其同時碰觸了兩個課題，即如何創造宜居城市環境，但又打造具有競爭力的旅遊城市。

西安市規劃局局長和紅星的一段話，道盡西安在城市發展、文化觀光邁向現代化道路的規劃思維——「人居城市是現代城市建設的重要理念之一，核心是為廣大市民而建……（西安）皇城的更新再造，建立有特色的城市景象對於擴大創造西安國際形象極其重要，其目的在於：吸引觀光及投資，振興城市經濟及城市建設發展、提高居民生活品質、建立西安城市自明性，凝結居民共識及認同。」（和紅星，2005，頁 48-49）。

## 3. 文化產業的轉向

雖然，曲江新區的規劃在 1990 年代提出發展旅遊與完善城市功能的意圖，成為推進西安城市開發的重要力量，但隨後又出現往文化產業轉向的發展規劃。

2005 年的計畫，提出將曲江新區的建設定位為：「按照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曲江新區發展規劃和總體規劃，曲江新區將建設成為以盛唐文化為特色，集旅遊、居住、休閒、會展、商貿、科教等功能為一體的城市發展新區，成為中國西部重要的遊客集散地和旅遊中心。」並區分成 2003-2005 年第一期、2006-2008

年第二期，與 2009-2011 年第三期的中長期開發計畫。在 2008 年提出的曲江新區發展規劃，清楚宣示往「文化產業戰略三步驟」<sup>2</sup>。

為順利往文化產業發展轉向，西安曲江新區管委會於 1998 年投資設立國有獨資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簡稱曲文投)<sup>3</sup>。曲文投為西安市政府批准，註冊資金人民幣 42 億元。資產總額從設立時 6000 萬，增長到 2009 年將近 158 億元。是引導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龍頭，逐年依著發展需求，不斷設立子公司，目前集團旗下十一家子公司，業務涵蓋旅遊、會展、影視、演藝、商貿、餐飲、物流、物業、娛樂、房地產等多個產業門類<sup>4</sup>。2006 年，中國文化部授予曲文投集團「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基地」稱號；2007 年 8 月，將曲江新區命名為：「國家級文化產業示範區」；此等稱號說明曲文投在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過程的領導地位，2009 年被中國企業聯合會評定為：中國服務業 500 強企業。

除前述被賦予的種種稱號，對曲江開發模式的肯定，更可以從其不斷獲得重大開發案任務，證明其開發模式所得到的高度評價—2006 年 12 月，陝西省人民政府將「法門寺佛文化景區」9 平方公里的開發計畫委託曲江新區管委會執行。西安市人民政府將「樓觀台道文化展示區」22 平方公里的開發工作也委由其辦理；2007 年 5 月，西安市政府再將「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及周邊地區 24 平方公里的改造建設任務交給曲江新區管委會；曲江新區管委會成為開發大西安地區的運籌核心，其負責的文化產業園區總面積已達 73.38 平方公里；運作機制與內涵雖號稱為文化園區開發，但從規模、投資與產出來看，已超越城市規劃開發尺度，成為一種支配性的城市發展模式。

### 3-2 曲江新區開發策略

曲江新區開發策略大致可以從五個主要策略原則來觀察，此幾項策略原則也隱含時間點的布局。分別是：1. 打造「現代化」之城市基礎設施。2. 以大唐芙蓉園、曲江海洋世界等大型開發計畫，作為全區開發的推進器。3. 以打開大雁塔北廣場作為吸引市民認同的空間手法。4. 設定以唐文化作為建構符號經濟之核心。5. 開發同時進行城中村的拆遷與安置，以達成西安的「都市更新」。

曲江新區的開發依循城市規劃理性，從都市基礎設施鋪設開始，先後投資 30 億元人民幣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舉凡污水處理、供水系統、電力、瓦斯、通訊等各種管道系統、綠化及道路系統開闢等。設置曲江水廠與南郊水廠，每日供水 120 萬噸，是曲江池的用水來源。設置曲江南變電站與北變電站以確保新區內的用電所需。

曲江新區幾個具指標性的工程均已完工，如：大雁塔北廣場，總投資 4 億元人民幣，2003 年 12 月 31 日正式開放；大唐芙蓉園累積投資 13 億元，於 2005 年 4 月 11 日開幕；曲江海洋館投資 2.2 億元，2005 年 2 月 5 日開放。

曲江新區開發完全依賴市場原則，免除政府的財政支出與投資，以開發建設計畫募集資金，其中經由房地產投資，擴大收益的模式，投資完全回收尚有盈餘，但造成的效果則是土地價格的飆漲。根據資料，自 2002 年至 2008 年，新區累積投資的 120 億元人民幣，其中 80 多億為企業自主投資；大雁塔北廣場、西安曲江海洋館、大唐芙蓉園等重大開發計畫投資的 30 多億元，從一開始便規劃依周邊收益來達成平衡。2008 年的數據資料，大雁塔北廣場總投資 4 億元，其中，徵地拆遷費用 2 億，建設費用 2 億，周邊的房地產開發已銷售 1.66 億元，預計部分尚在建設的建案中還有 2.66 億元的收益，收支平衡尚有盈餘。曲江新區土地從 2005 年，每畝 30 萬元人民幣，到 2008 年，已經上漲五倍，達到每畝 150 萬元人民幣。

曲江新區的開發機制與模式，從最初「曲江新區管理委員會」到設立「曲江新區發展有限公司」，後於 2009 年 6 月掛牌成立「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並設置於曲江新區內。該公司係由陝西省

政府，西安市、延安市、榆林市政府和省投資集團共同出資，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組成，主要營運內容包括：重大文化產業計畫戰略投資、融資和風險投資，以及新興文化業態風險投資等國有控股大型文化企業，註冊資本 22 億元人民幣，是中國最大的文化產業投資公司。確立以「唐文化」作為開發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概念與符號，並以成立控股公司擴大資金投入與開發規模，以西安市及周邊地區作為整個文化產業擴張發展場域。

以前述的分析架構來說，曲江模式為西安所獨有，將開發商與國家機器的力量緊密結合，以文化為名，透過土地資本的運作，逐步大規模地進行城市開發與建設—同時在文化資本與土地資本兩個層面擁有壟斷性的支配權力，其龐大的開發規模、土地面積與投資金額，若非國家機器全力支援，絕非一般開發商有能力負擔與操作。就其所帶動之都市空間生產，一方面滿足一般市民的需求，建構為西安城市現代化進展的面貌，另一方面，面向來自全球的觀光客，訴說西安文明歷史，同時，具備了現代化樣貌的城市生活空間，對內對外均足以建立其文化霸權。但此文化霸權除了透過都市發展模式，呈現出現代化都市生活樣貌外，更為細緻地表現在空間之文化形式中，故下節以大唐芙蓉園為分析案例，討論其所謂「唐文化」主題公園是如何藉由建築設計與空間表徵，來再現其自身的歷史文化想像。

#### 四、從歷史中的曲江到打造「大唐芙蓉園」主題公園

要在城市發展中建構所謂文化或遺產旅遊產業（heritage tourism），依賴於所謂的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整合與建構，即必須將自身轉化為一個可供觀光客遊覽、觀賞的「景觀」，亦即馬坎納、爾瑞等人所論及，觀光產業、觀光地點與觀光行為，乃是一連串具有社會意義的組織化動態過程。在此一將自身客體化為觀光景觀與對象物的意義建構過程，其運用、販售的符號經濟策略為西安悠久的歷史元素，曲江新區採取歷史主題公園，以複製的歷史場景來創造其文化觀光魅力，景觀規劃、建築設計專業者成為此一景觀建構與客體化（objectified）過程的核心作用力量，從設計者的角度言，其同時面對三個向度的課題。

首先，面對「主題公園」此規劃設計類型的相關課題。「大唐芙蓉園」為運用現代設計與營造技術所打造的主題公園，除了在設計層面有特定文化與美學符號外，尚須因應此建築類型空間計畫與旅遊產業需求，並所謂的「曲江模式」發展成為以主題公園帶動西安整體文化產業、旅遊觀光與都市發展的核心。

其次，需思考曲江文化資產的歷史意涵，即在歷史文化名城環境背景下的設計課題。主題公園並非文化資產保存的修復或再利用，而是全然新建案；然而，因其所處環境背景為西安古城，如何與古城環境氛圍相協調，為設計者面臨的另一考驗。

第三，對中國古典皇家園林空間格局的現代轉化。與傳統建築一樣，中國傳統園林建築形式與空間格局，如何面對現代營建技術與生產體系的改變與轉化，為另一組較少討論的課題。

此三個面向共同構成大唐芙蓉園演繹為西安旅遊經驗中的文化與美學符號，也成為設計者所需回應的挑戰。以下，試圖分別從此三個層面分析大唐芙蓉園空間形式與文化符號的建構。

##### 4-1 中國主題公園發展歷程中的大唐芙蓉園：以唐文化主題公園帶動西安文化產業之發展模式

主題公園（theme park）在中國的建設發展歷程最早為 1989 年深圳的「錦繡中華」，仿擬「世界之窗」、「小人國」的再現形式，以中華民族發展的文化歷史故事為主軸，搭配中國各地自然與文化景觀的縮小

再現，引發中國各地興建主題樂園的熱潮。但由於其主題公園的原型係借自西方國家，如：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等以童話故事、卡通人物、或電影故事場景為主的主题故事，故中國早期主题公園發展往往借用了，如：「童話城堡」、「未來世界」、「世界公園」等表現形式，導致因主题重複、不具創意、以及管理方式不佳、景觀營造粗糙等諸多原因，而面臨經營危機。在迪士尼、環球影城等國際主题公園相繼登「陸」，文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中國境內主题園的經營與表現形式也逐漸轉向以中國歷史文化地理景觀為母題，並以經營地方特色文化主题，作為結合城市旅遊、營造文化觀光魅力的形式。西安的大唐芙蓉園，借景曲江山水，以中國古典皇家園林格局，以盛唐文化為主题的表現形式，在當代中國的主题公園中，具有其代表性（楊曉曼、段淵古，2007）。

事實上，相對於主题公園此空間類型所引發都市與區域空間規劃、土地開發、文化產業、創意經濟與文化資產保存與社會學等面向的批判與討論，曲江地區長期以來的歷史發展，為促成大唐芙蓉園空間生產在歷史層面重要的物質性基礎。1996 年，當江澤民對西安提出發展願景時，西安市政府便企圖開發曲江地區的旅遊產業，當時提出「長安芙蓉園」旅遊度假區的方案，但後來因規劃方向共識不足、資金等問題，該方案擱置。2002 年，曲江管委會決定重新啟動長安芙蓉園的開發，重新討論其定位與主题，經過八個多月的討論，於 2003 年 4 月，正式將其定位為「中國第一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大型皇家園林式文化主题公園」，因唐文化象徵中國文化的鼎盛，故改名為：「大唐芙蓉園」。

2005 年 4 月 11 日正式對外開放的「大唐芙蓉園」位於西安城南，鄰接大雁塔及大慈恩寺遺址公園，共同構成西安城外核心景點區域。其興建地點在唐代芙蓉園遺址之北，仿照唐代皇家園林式樣興建；佔地 66.5 公頃中，20 公頃為水域面積。花費 13 億人民幣興建，其宣稱有許多「第一」。舉凡全中國最大的仿唐皇家建築群；全球最大戶外香化工程<sup>5</sup>；全球最大的水幕電影及水景表演；全國最大的仿唐宴「開發基地」—御宴宮<sup>6</sup>；全中國展現唐詩歌文化最大的雕塑群等。

相較於美式迪士尼世界、環球影城販售「童趣」、「夢想」與「探險」等具高度理想色彩、抽離日常生活世界、脫離既有社會脈絡的烏托邦；大唐芙蓉園所訴求的卻是西安、乃至中華民族自我所宣稱的、過去的「光榮歷史」的符號化表徵。此將自身文化認同與歷史商品化、符號化的過程，雖然同樣具虛構色彩，但卻同時是個將自身景觀化、客體化、視覺化，卻又藉著宣稱過往自身輝煌歷史，炫耀其文化優越性的潛意識，此一藉由重新建構的過往歷史來宣稱自身文化傳統的優越，進而構築出文化大國的文化霸權心態，成為中國近年來繼經濟快速擴張後，另一股文化擴張的龐大趨力。

#### 4-2 中國古典園林的全盛時期：隋唐皇家御苑到公眾遊覽勝地的曲江池

唐代芙蓉園遺址原建立在「曲江」。曲江為中國歷史上久負盛名的皇家園林和京都公共自然景區。自秦朝起、迄於唐代，作為皇家園林已有長達 1300 年的歷史，被譽為中國古典園林的先河之一。據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於 1958 年的考古實測，曲江池南北長 1360 公尺，寬約 500 多公尺，面積 0.7 平方公里，呈現南北長、東西窄的不規則狀（王雙懷，2000，頁 533；張家驥，1986，頁 97）。秦代，利用曲江地區水澤相間、景致優美的自然景觀，開闢了著名的皇家禁苑—曲江，從此成為皇家禁苑上林苑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建有離宮宜春下苑。漢朝劃為宜春苑，漢武帝下令疏浚池渠泉源；隋朝，隋文帝遷都大興城（西安），開始進行城市和近郊水系整理與配套工程；到了唐朝發展更為完備，形成完整體系，同時，解決城市用水、宮苑用水與水路運輸等問題（周維權，1990，頁 63）。其中，以開鑿黃渠以擴大曲江的水源，曲江因水面擴大風景益佳，逐漸發展成為御苑兼公共遊覽地—並結合地形，以城牆為界，將曲江分成兩部分：城牆外的曲江南部建為芙蓉園，設為離宮。城牆內的曲江北部作為京城內公共遊賞之地。

隋唐時期為中國園林發展的全盛時期（周維權，1990，頁 10），其中，皇家園林又有大內御苑、行宮御苑和離宮御苑之分。屬於行宮御苑的曲江在此階段進入繁榮興盛時期，雖闢建為皇家禁苑，但也同時是公共遊覽地，是城市裡的市民公共遊覽地，同時兼有皇家御苑的功能特性，在以皇權政治為軸心的封建社會是極為罕見的情況，而曲江池的繁榮也反映出盛唐時期，政局穩定、社會安寧的狀態（周維權，1990，頁 75）。

曲江池作為皇家與市民共同遊賞的場域，並發展出其特有的活動形式與節慶，例如，自唐中宗李顯神龍年間（705-707 年）開始，會在曲江畔為新科進士舉行盛大慶祝宴會，稱為「曲江宴」<sup>7</sup>，宴後遊覽大慈恩寺，並在寺內的大雁塔上題名（張家驥，1986，頁 97）。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增引南山水、疏浚漢武泉，將芙蓉園內的水面擴大到 70 萬平方公尺，稱為：芙蓉池。修建紫雲樓、彩霞亭等大量園林重要建築。為了便於經常到曲江芙蓉園遊幸作樂，唐玄宗命人沿南北向城牆內側，修築了專門由皇宮至芙蓉園的「夾城複道」，將東面和北面接大明宮的一段城牆築城雙層，中間夾著一條大道，成為大明宮、興慶宮通向芙蓉園專用的特別通道（張家驥，1986，頁 92；周維權，1990，頁 95）；城牆內的曲江水面稱為「曲江池」，亦名為：北池，保持其自然風光供百姓遊賞。曲江宴到唐玄宗時期，已成為民間重要的節慶娛樂活動，故每逢曲江大會，唐玄宗登臨紫雲樓與民同樂，使得曲江象徵唐朝昇平之世、為君民同歡歷史名蹟的傳統享其盛名<sup>8</sup>。

安史之亂後，殿宇樓閣大半傾廢，曲江處於衰敗狀態（周維權，1990，頁 75），唐文宗太和九年曾試圖恢復舊日景象，修復曲江池紫雲樓與彩霞亭，但仍如曇花一現（張家驥，1986，頁 99）。唐代末年，遷都洛陽，長安城的宮室房屋與曲江芙蓉園均毀於一旦。20 世紀初期，日本學者足立喜六曾對曲江風景區進行考察，在其《長安史蹟考》書中提及其探訪曲江遺址時，所見直徑約一里的圓形凹地曲江池殘跡（轉引自王雙懷，2000，頁 535）；到 1950 年代後，唐代遺留痕跡越來越少，後人只能在原址上看到農田與乾涸水體。但知悉曲江歷史的人若踏勘現狀，則曲江的歷史地貌仍依稀可見（張錦秋，2006，頁 12-13）。

曲江地區雖已不見任何歷史痕跡，但從歷史的紀錄來看，以中國園林發展歷史來檢視曲江地區的環境變遷，曲江將人文景觀與自然地景融為一體，表現出中國造園思想的核心意念，從秦漢隋唐皇家御苑與公眾遊樂地的演進變遷，象徵中國園林藝術文化及城市文明的進展。亦即，從曲江地區歷史發展脈絡與地理區位而言，在此地興建以曲江文化為賣點的主題公園，有其無法抹滅的歷史條件優勢，保證了販售唐朝皇家園林體驗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也得以宣稱其自身與都市文化資產保存掛勾。

繼描述曲江地區的歷史背景、中國主題公園發展歷程兩個主要影響大唐芙蓉園空間生產的社會脈絡後，下節則以此發展脈絡為前提，試論設計者所介入的空間文化形式表徵的生產歷程。

#### 4-3 空間文化形式表徵與建築／景觀設計：大唐芙蓉園設計

大唐芙蓉園被設定為帶動西安城市旅遊、文化觀光的啟動器，以空間文化表徵來承載、體現自身為觀光之景觀；其所設定所欲表徵之可供觀看與溝通的價值，在於象徵了西安古都歷史鼎盛的「唐文化」成分，因此，其所意涵的歷史元素透過一個物質化、具象化的方式與過程因之傳譯出來。中國古典園林及所謂唐代宮殿式建築樣式，成為其可直接採用的形式元素。然弔詭的是，現今流傳關於唐朝時期古典園林及其宮殿建築樣式的文獻與圖像資料極為有限，除了政策規劃與開發者的設定外，大唐芙蓉園的設計方案，不論是以文物保護的歷史考據模式切入設計，或是現代建築從無到有，仰賴於建築師個人創意表現的模式進行空間生產，均可謂為是透過設計者的理解、重新加以詮釋的再創造過程。借用列斐伏爾（Lefebvre, 1991）的空間生產三元分析架構來看，其中不僅牽涉了對於空間表徵（representation of space）

的理解、也與表徵的空間 (representational space) 密不可分。前者，牽涉設計者對建築如何承載唐文化的表現符號，攸關其在空間形式層次方面的運用；對主題公園此類型建築方案計畫需求的掌握，展現出整體的空間架構。

以政策規劃與開發者的角度言，提出所謂「皇家園林式文化主題公園」方案，繫於盛唐時期，為「公認」西安城市發展歷史上，最為「燦爛」、「鼎盛」的歷史時期，而挑選緊鄰曲江遺址基地興建大唐芙蓉園，除了欲挪用其所殘留的歷史光環外，同時，可以反映出在歷史發展過程，其區位對應於大雁塔、慈恩寺等文化資產的空間優勢。針對區位選擇問題，負責大唐芙蓉園整體規劃設計的張錦秋<sup>9</sup>建築師提到，「規劃區位不在歷史原址，而是選址在唐代曲江北池所在地，這樣，既保持了唐大雁塔東南的方位和距離，與歷史記載一致，同時又可避免保護遺址、恢復故舊等一系列文保問題。」(張錦秋，2004，頁 37)



圖 4-1. 大唐芙蓉園與周邊主要景觀位置關係圖 (資料來源：google 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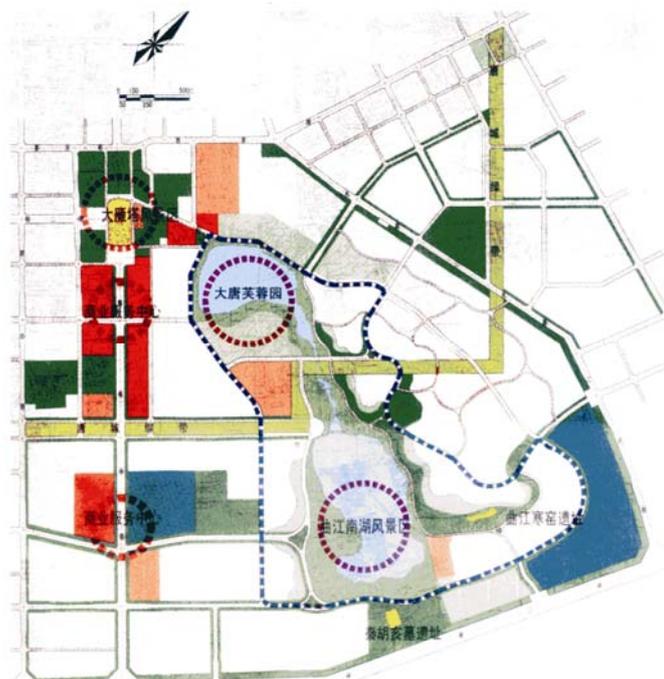


圖 4-2. 大唐芙蓉園與周邊主要景觀位置關係圖 (資料來源：根據張錦秋，2006；本研究重繪)

張建築師多次接受訪問、演講時，均強調其在西安從事建築設計工作多年，始終著力於思考其建築創作如何與歷史名城的環境景觀、歷史脈絡相互協調，她認為，在歷史文化名城中，現代建築發展的道路，應該是選擇保護文化遺產、延續城市文化，傳統與現代和諧共生的道路。歷史名城基於不同區位、路段、文物保護區等不同條件，對於建築設計植入該地區的要求也不同。然而，該團隊在多年的專業實踐中逐漸形成的概念是，在歷史文化名城特定的環境中，建築創作應該是多元的，形式是多樣的，但要求現代建築的風格、體量、造型、色彩與歷史文化環境相協調。總結其多年在西安的建築創作實踐，大致可以歸類為三種類型：第一，現代建築創作的多元探索。第二，在有特定歷史環境保護要求的地段和有特殊文化要求的新建築創作。第三，古蹟的復建與歷史名勝的重建。

第一類的作品像是其 1990 年初的成名作「陝西歷史博物館」，屬於中國傳統建築元素現代化的轉化；第三類的作品屬於古蹟的修復重建，如：法門寺的整修復建；「大唐芙蓉園」屬於第二類，是一座「以唐文化為內涵，以古典皇家園林格局為載體，演繹盛唐名園，它整個體現的氣勢、文化是唐代的。全國規劃力求做到歷史風貌、現狀地形和現代旅遊功能三者相結合，採用了山水格局，建築布局體現了皇家園林明確的軸線及對應關係，層次分明，以自然景觀為依託，配置景點和景區。」（張錦秋，2007）

另於接受訪談時，張建築師表示，曲江地區雖為皇家園林的遺址地區，但大唐芙蓉園此一個案子是新建築，而非在遺址上興建，亦非遺址復舊，純粹是座以唐文化為主題的、現代化的主題樂園，因此，建築師在設計時比較能夠放得開。若是要作遺址保護或復原，則必須要有很多很仔細的考證。但事實上，張建築師與其設計團隊花費相當時間，進行唐代皇家園林建築的考察工作，而構成了園內整體空間架構，在組織空間與規劃方面，如何運用古典建築與園林元素，同時又能納入現代都會與休憩生活所需的空間型態，為其重大挑戰。

從張建築師對西安城市發展、中國當代建築現代化、與西安歷史文化名城的環境脈絡，三者之間的意念可以窺見，雖然「大唐芙蓉園」並非在文化遺址上復舊，係屬為觀光活動打造的景觀，但由於其宣稱為：「盛唐文化的代表」，遊客藉此皇家園林遊覽機會來認識唐文化，景觀的提供者究竟要將自身創造成何種可供理解的景觀與文化載體，以構成其透過文化觀光共同建構之文化霸權的一環？即文化產業運作邏輯的首要原則，必須以既存之文化資本為基礎，但文化資本無法憑空捏造。從美感體驗經濟的層面來說，「本真性」的感官體驗，是文化旅遊販賣服務外，關鍵的商品與符號來源。故應可以從此角度來分析、理解大唐芙蓉園的整體規劃設計與空間生產。

#### 4-4 對主題公園的規劃思考

一般人對張錦秋建築師的認識，多稱其為梁思成大師的得意弟子，事實上，張建築師雖有梁思成先生師生情誼的高度期許，但張建築師在清華大學建築研究所階段的學習，卻在梁先生探討已久的《營造法式》與中國園林的探索兩者間，選擇了後者，此研究志向得到梁先生的贊同道：「我雖然喜歡中國園林，但卻沒有系統地下過功夫，你有志於研究中國園林，這很好。這方面請老莫（即莫宗江教授）指導最合適，他對古典園林研究很深。」（張錦秋，2006，頁 150）張建築師的碩士論文選定北京的頤和園作為研究主題，針對北方皇家園林、江南私人園林、寺廟園林與自然風景區等，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對此主題有一定深度的認識與掌握；其碩士論文定稿已屆 1965 年，時值中國文化大革命前夕，其對傳統建築與園林文化的薰陶訓練，一夕間被罩上「封資修」的陰影，而建築師對中國古典園林的心嚮往之，卻戲劇性地在曲江新區開發歷程，重新回到對中國古典園林的探討（張錦秋，2006，頁 152），一方面說明善用老祖宗文化資產為中國此一波全球化發展趨勢下的重要策略，另一方面，也說明張建築師本人中國古典園林深厚的專業知識。

針對大唐芙蓉園主題公園規劃設計，可從下列幾個面向切入其思考。第一，以中國園林整體架構思維，配置出公園全區空間組織的景觀體系。其次，部分建物係以考據方式，沿用或擬仿唐代芙蓉園的建築造型與故事，塑造形式、空間格局、建物風格與文化內涵的相近性，視覺化、景觀化此類特定建築物。第三，基於商業考量的空間規劃，考量當代生活模式的需求，如何恰如其份的轉譯為其他造型或空間，將其使用融入古典園林的設計手法，或強化、表徵出其文化符號系統，服務於文化產業的需求。

### 1. 中國古典園林空間表徵的挪用與再現：建築師之匠心獨運

雖然，張建築師指稱此乃是一個現代的主題公園，不像一般古建築修復，需要經過較為詳盡的考古與研究調查工作；但事實上，以其深厚的中國園林知識基礎，在大唐芙蓉園的總體布局中，係運用中國傳統的規劃方法來進行全區的空間配置。首先，在園林規劃方面，確定其山水格局，從歷史考據來看，唐朝的曲江地區係以自然地形塑造出帝王與百姓共同賞遊的天然景觀，因此，在芙蓉園的規劃方面，也採取此利用地形變化的原則、園內形成南高北低、南部岡巒起伏、北部湖池坦蕩、水闊天高（張錦秋，2006，頁 15）的景致格局。

至於，園區內的建築配置，張建築師指出，中國傳統大型建築群有一套定位布局的經驗，參見圖 5，軸線的構成與網絡體系來控制全局。因此，在芙蓉園的規劃中，在地形圖方面以四十公尺見方的座標網，作為布局的基本網絡。軸線的取向、建築布局選點，大致以此格網為基準，以期在平面關係方面，構成嚴密的對稱、對應、對景與呼應的景觀網絡。再進一步，結合地形、地貌和建築功能確定各園林建築的形制和造型特徵，親水的亭廊、宏大的樓臺、疏朗的院落、開敞的軒榭、私密的館舍、高低錯落、虛實相生，各在其位、各顯其能，相互成景得景，共同構成龐大豐富的園林景觀體系（張錦秋，2006，頁 19）。



圖 5. 大唐芙蓉園全區配置圖（資料來源：根據張錦秋，2006；本研究重繪）

從圖 5 的全區配置來看，整個園區規劃以主要入口西大門提供遊園遊客進入。入園後的迎賓廣場可選擇直接通往餐飲區的御宴宮，即僅使用御宴宮餐飲服務功能而非遊園者，或循著設定之主要遊園動線次第造訪。進入園區的視覺意象是跨越水岸的芙蓉橋。事實上，從平面圖來看，芙蓉橋繼續前行便是紫雲樓所在處，但中間以障景手法，創造迴遊路徑，另構成從南門、鳳鳴九天劇場、紫雲湖和紫雲樓，一

組呈現強烈中軸線的關係，凸顯出紫雲樓位居全園區重要視覺端景的象徵性角色。西門入口、御宴宮與曲水流觴構成西翼區；沿著水景、逆時針方向構成的遊園動線，循著遊園路徑來配置景點。東翼的唐集市、唐詩雕塑區與茱萸台構成園區最高峰，意欲提供北眺整個芙蓉園、南眺曲江，與遙望終南山的制高點。漸次緩降後，綿延 279 公尺長的彩霞亭廊，沿著湖岸蜿蜒，構成緩步觀覽水景、欣賞園區湖岸景致的絕佳路徑。觀察園區空間構成可以發現，針對一般遊客，特別是大量團體客，主要遊園範圍集中在湖面南半區，至於，北半區主要以連通的水岸廊道為主，其配置了園區內屬較為特定目的用途的建築物，例如，園區北端的芳林苑、仕女館、杏園和陸羽茶社等為四組較大型的園林建築，分別作為園區附屬高級精緻旅館、展現唐代女性文化的仕女館、舉辦會議與展覽的杏園，以及欣賞體驗茶文化的陸羽茶社。此類建築賦予了強化大唐芙蓉園主題園區之特定文化功能，至於，其外在表徵則作為搭配中國古典園林的傳統建築，構成園區水景與傳統宮殿建築、亭台樓閣相互輝映的圖像景觀。由於，傳統中國園林多為私人庭園，精巧在於有限的空間中，創造出無限的變化，掌握尺度、以小見大。但大唐芙蓉園每日需接待大量遊客，巨大的尺度、碩大的量體將可能構成大而無當的建造物堆疊，建築師採取將各個量體分散，一方面彰顯各個建築的特性，也藉此調整園區尺度上的關係。此為解決傳統園林精巧的空間尺度與現代主題樂園龐大尺度矛盾的設計手法之一。

針對當代旅遊設施與唐代古典建築園林的整合共存課題，張建築師以園區內多層次的道路體系、豐富的廣場系統、以及建構公共建築尺度等三種設計手法來整合（張錦秋，2006，頁 20-27）。張錦秋提及，作為大型現代化公園與傳統園林的重要區別是，在遊客數量與活動規模方面有極大的差異，例如，需從遊覽與服務角度，同時，提供景觀與功能兼具的交通路網，因此，在園區內設置了主路、支路與小路三種層級的道路，並結合景點、地形、水體與植栽等加以組合，此基於園區服務的設計，一般遊客也許未必覺察。

從圖 6 的園區動線與主次出入口分析園區動線系統，主要動線路徑方面，以水景為核心，沿水景遊園的路徑布局，配置主要的建築物。從西大門主入口入園後，重要設施均配置在南側，包含主要建築：紫雲樓、用餐空間御宴宮、表演廳鳳鳴九天劇院等，遊客遊園時間有限，南區設施即可滿足基本的遊逛、餐飲、觀賞表演與購物等活動的空間類型。但各主要建築周邊，則配置了次要的動線系統，提供時間較充裕的遊客，可以小尺度迴遊的方式，有較為深入的空間與文化體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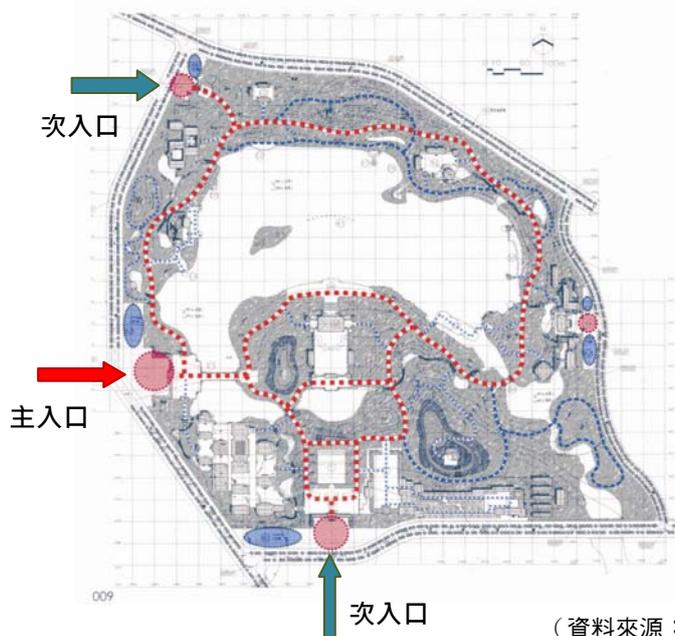


圖 6. 大唐芙蓉園園區動線圖

（資料來源：根據張錦秋，2006；本研究重繪）

現代的主題樂園因為要為成千上萬人提供開展活動的場所，寬敞的室外場地不可或缺，且廣場等開放空間同時肩負了都會防災、人群聚集、疏散的功能，為了符合此一需求，在園區的西、南、北三方大門外，均分別設計了不同形式的廣場。在園內的建築物周邊，同樣也設計許多廣場，例如，紫雲樓建築正面與背面均設有大型廣場，一方面容納人群，提供觀看演出與餐飲等商業服務的功能。亦即，中國傳統建築與園林的外在表現形式，融入了西方城市的廣場系統概念，以滿足旅遊服務業與傳統園林小而精巧的根本差異。

## 2. 視覺景觀化唐代宮殿建築形象重現為現代觀光服務設施

園林建築不同於一般建築物，除了滿足居住等實際需要外，往往是園景的構圖中心，即「按時景為精」（吳肇釗，1992，頁 52）。由於，芙蓉園以大量水景、吸引遊人梭遊漫步其間為主，建築物的配置構成凝聚視覺經驗之文化體驗的符號要素。在全園的四大功能區，共有 40 多個專案，其中最具有地標性的建築，則主要為西大門入口處，中軸上的主樓：紫雲樓，望春閣和園區外的大雁塔相互呼應。



圖 7. 西大門入口門樓與廣場（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一般遊客進入園區的路徑是從西大門廣場入園。西大門廣場緊鄰西安的芙蓉西路，也是西安市民日常路徑會經過的場景，由兩層七開間的門樓與南北各一座出闕樓組成，並且連結包含入口購票、廁所、地下停車場出口等服務設施，入口廣場及其水景，成為都市景觀的一環，也構成其景區視覺化的端景。

根據史料記載，紫雲樓是建在城牆上的全園主樓，其下有門連通牆外的芙蓉園與城牆內的曲江池。張建築師取意象化的方式，將紫雲樓設計為整個園區的地標性建築；紫雲樓位於在全園區中心，將二層樓閣置於相當於城牆高度的臺座上，臺座內部則設置封閉的展示空間廳，採擷了敦煌壁畫的手法，將紫雲樓東西兩側各設置兩座獨立闕亭，並以四架虹形飛橋，將四座闕亭與主樓連結為整體，強化了紫雲樓在整個園區的拔卓氣勢。除了紫雲樓外，前述提到四座主要建築物，如：芳林苑、杏園、彩霞亭、望春閣等，均從史料中擷取素材，依託其量體、造型、風格或格局而來，布置於全園景區。

位於整個園區水池北岸東側的仕女館，從園區的規劃方面，是以仕女文化展示為主題的庭院式布局，並設有平台，作為園區內表演活動場地，該區的主建築望春閣，閣樓採取六角型的平面，與周圍的大雁塔遙相呼應，但在造型方面則有各有擅場，創造出以唐代宮殿形象建構的景觀視覺。

## 3. 滿足文化產業想像的設計發展向度

為了同時滿足文化旅遊需販售的符號經濟與服務，當以文化資本建構出文化商品與符號，某個程度也是重新建構、打造某種價值及認知。舉例來說，在唐朝時期的宮殿建築，根據考證，應該是以土黃色

為主；但由於要強調出大唐芙蓉園的大器恢弘、以及皇家宮殿建築的氣派，加上一般人對宮殿建築的印象是以大紅色為主，故最後園區主要色系仍是選定紅色。甚至，是刻意調配出來的紅，後稱為：「曲江紅」，並以此作為商品販售的符號。此符號操作過程說明了當打造文化觀光符號與景觀，實具有高度之形式操弄意涵，而未必與文化本質相涉。

從建築設計層面言，由於此一開發案被設定為：「文化產業」，建築師一開始便同時拿到文化策劃與經營策劃兩方面的計畫書，要讓該設計案同時滿足兩方面需求是歷經諸多討論、辯論與相互間的折衝<sup>10</sup>。



圖 8. 大唐芙蓉園御宴宮平面圖（資料來源：根據張錦秋，2006；本研究重繪）

一個具體的例子是，為了園區內商業經營的需要，經營規劃者希望可以規劃到 4500 人左右的用餐需求空間，為了滿足此種的服務需求，最後的折衷方案是提出「御宴宮」的計畫，可以容納 3500-4000 人同時用餐，一方面從視覺上，在水岸空間旁創造出龐大壯觀的建築群落，宣稱可展示、表演唐朝豐富的皇家飲食文化，另一方面，則滿足觀光客用餐的服務需求；同時，目前另開闢出喜慶婚宴專用的大型宴會空間，成為另一個以皇家婚宴為賣點的文化消費模式。亦即，由於肩負販售文化經驗的任務，在設計方案發展的導向方面，是以結合文化形式與現代活動模式，故在動線規劃，也以符合實際使用取向的考量，配置在鄰接入口的區位動線。至於，在建築內部的空間規劃，則採取了四軸並行的方式，組織了包括：婚宴、壽宴的大型宴會廳；到中型包廂；以及採取彈性隔間，可打開隔間變成大宴客廳的不同用餐空間。至於，在整體空間感受的營造方面，借用建築物外部的湖畔景觀，建構出有湖岸景觀的用餐空間，為使空間更為寬敞完整，所有機房廚房均設置於地下室。

此外，以唐風建築外在形象重現為觀光服務設施也成為園區內必然的設計手法。例如，命名「鳳鳴九天」的小型歌舞劇院，為園區內歌舞秀表演的現代化場地。而面對湖岸景觀的紫雲樓周邊廣場，則成

為臨湖廣場大型活動與水上表演的主要場地。園區南側另有以唐式建築構築出的商店街，作為觀光客遊逛、消費空間。



圖 9. 大唐芙蓉園御宴宮外觀照片 (資料來源：張錦秋，2006)



圖 10. 大唐芙蓉園御宴宮宴客廳室內照片 (資料來源：張錦秋，2006)



圖 11. 紫雲樓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圖 12. 紫雲樓與四座關樓 (資料來源：本研究拍攝)

## 五、結語

文化保存與都市發展的關係，如同光與影之間的關係，沒有光，影子無從存在，然而，沒有影子的形象化，也難以表現光的無法捉摸。西安若是沒有如此豐厚的文化資產，文化觀光旅遊業則無從存在，但若只是讓歷史凍結於時間流逝中，未能讓歷史藉由古蹟來展現自身，則人們亦無法閱讀自身的主體認同，以及文化經驗的發展歷程。此反身性如同傅柯提出的「差異空間」(the other space) 概念，藉由鏡像的對照，人們看見自身的缺漏、偏差、扭曲與壓抑所在。

本研究欲探究的兩個主要問題，即以文化觀光、文化產業作為全球化潮流下的另類發展模式，在經歷社會主義的中國，與其他先進工業化國家是否有所差異？以及在此一文化觀光化的過程，建築與設計專業者的設計回應為何。張建築師以其深厚的中國傳統建築與園林的素養，轉化出值得仔細品味其空間與文化內涵的大唐芙蓉園，也提供了另一種歷史文化名城在現代化都市發展過程，為了保有其文化價值所能對應出的某種建築空間解答與文化想像。

從西安的經驗可以清楚地觀察其發展出雙軌制，一方面提高規格地進行豐厚文化資產的文物保護工作，與此同時，則挪用此文化資產的符號與美學論述，作為包裝、經營、形塑、打造都市文化旅遊經驗的空間氛圍與場域。

開發文化產業的首要前提，在於一個地區或社會中，其豐厚的文化資本所能提供的發展基礎，缺乏發展基礎，任何文化產業無法生根茁壯。然而，在中國似乎呈現出來的精神分裂狀態是，「文化產業」是賺取經濟利潤的良好工具，以文化優勢帶領中國快速邁入現代化國家之列；但對老祖宗所留下來的寶貝，應該列入文物保護的對象，則除了提供觀光客遊覽之外，繼續保持高度的「凍結式保存」狀態，兩種模式互不相涉，各自遵循其遊戲規則；因此，在本文所探討的大唐芙蓉園此一案例，從開發商、規劃者到建築設計，雖應用唐朝相關皇家建築園林的元素或史料證據來進行園區的規劃營造，但始終將其清楚定位為：「主題公園」，而非歷史遺址或文物建築。

在文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下，觀光景觀必然經過此一對象物客體化、視覺／景觀化的過程，並以歷史文化為其觀光價值背書，一旦以文化為好生意，必然需面對販賣祖產之事實，那麼，應如何看待文化具有高度交換價值？以文化產業與開發的個案經驗推展來看，曲江新區的確創造了極為驚人的開發能量，與大眾文化領域的媒體效應與話題，其透過市場操作機制，將大唐文化以商品包裝的方式呈現，亦「成功」地賺取了龐大的經濟利潤，然而，只要是繼續資本主義生產邏輯，必然需要產品可供銷售，為維持利潤，必然要不斷擴張其市場需求，讓文化工具化成為市場交換價值，似乎也成為不得不然的現象，那麼，若文化資產因此被賦予更高的交換價值，是否能夠以文化產業的建構，來換得文化資產保存更優位的發展？相對於歐洲各國文化歷史經歷長時間的發展，才漸漸衍生出現代化的變貌，並在其文化土壤中，融入一般市民的生活世界；而非如中國發展模式，在短時間內急速壓縮的文明進展歷程，為求現代化發展導致文化遭摧毀的危機，卻又同時能以文化符號作為擠身文化產業前線的利器，中國發展的經驗值得持續觀察與思考。

## 註釋

<sup>1</sup> 12 處國家旅遊度假區分別為：大連金石灘國家旅遊度假區（遼寧）、上海佘山國家旅遊度假區、蘇州太湖國家旅遊度假區（江蘇）、無錫太湖國家旅遊度假區（江蘇）、杭州之江國家旅遊度假區（浙江）、武夷山國家旅遊度假區（福建）、湄洲島國家旅遊度假區（福建）、青島石老人國家旅遊度假區（山東）、廣州南湖國家旅遊度假區（廣東）、北海銀灘國家旅遊度假區（廣西）、三亞亞龍灣國家旅遊度假區（海南）、昆明滇池國家旅遊度假區（雲南）。考量外國觀光客的需求與便利，所選定的開發點仍是以沿海地區為主。

<sup>2</sup> 「第一步：從 2006 年到 2008 年，實現曲江新區從旅遊區向文化產業示範區的轉變。建立初具規模的文化旅遊區、影視演藝區、會展廣告區、創意傳媒區。第二步：從 2009 年到 2011 年，強化曲江新區文化產業示範區主導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讓曲江文化企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使全區達到世界同類園區初級水準標準。第三步：從 2012 年到 2015 年，進一步提升曲江文化產業示範區文化行業的發展境界。提高服務水準，提高產出效益。基本上達到同類園區世界中等水準。」

<sup>3</sup> 根據 2009 年 8 月 9 日中國北京中央電視台的談話性節目「對話」中，訪問了包含：段先念、張錦秋等，參與曲江開發等關鍵人物時提及，西安市雖然自 1993 年便企圖善用西安的歷史文化資源，積極開發旅遊觀光產業，但始終未見大幅突破與進展；後經由城市規劃與地產投資開發商的建議，採取更為積極的開發手法，而非僅是以靜態方式展出各地文物。

<sup>4</sup> 這十一家公司分別為：西安曲江大明宮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旅遊（集團）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國際會展（集團）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影視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西安曲江文化演出（集團）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文化商業有限公司、西安曲江秦腔劇院有限責任公司、西安曲江出版傳媒有限公司、西安曲江職業圍棋俱樂部有限公司、西安唐華賓館有限公司；控股企業 4 個：陝西文化產業投資控股有限公司、陝西法門寺文化景區建設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國際會展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西安曲江大秦帝國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等。

<sup>5</sup> 係指在園區範圍內隨處均可以聞到香氣。

<sup>6</sup> 宣稱結合並展現唐式餐飲文化的處所，事實上便是提供遊園旅客團體使用的超大餐廳。

<sup>7</sup> 全唐文卷 0261 收錄李邕所寫，〈謝賜遊曲江宴表〉，記錄此曲江宴的活動。臣邕等言：臣聞昔時人君之德也，大撫萬國，必親諸侯，是以通下情，序賓禮。伏惟陛下因遇上巳，收接下臣，順發生之時，宏在鎬之宴。仙廚和鼎，浹洽於廣筵；舜瑟歌風，均調於曲水。士女車騎，充溢山川，林薄光華，纒連城闕。臣等撫躬何幸？報德無階，空慚屍素之名，豈適輪轅之用？不任載荷拊躍之至，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sup>8</sup> 杜甫〈哀江頭〉詩中寫道：「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景物生顏色。…」便是描述唐玄宗遊幸於曲江的盛況，並感嘆盛世不再、不勝欷噓。

<sup>9</sup> 張建築師為中國工程技術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師承中國建築之父梁思成；畢生執業生涯都在西安，迄今近四十年，因其作品風格多為凸顯西安深厚文化歷史，強調與週邊環境的協調、反映文化深度與意象等，被稱為新唐風建築的代言人。

<sup>10</sup> 以上資料取材自前引談話性節目「對話」之訪談內容。

## 參考文獻

1.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2.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London: Blackwell.
3. MacCannell, D. (1999).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6)
4. Moscardo, G. (2001). Cultural and heritage tourism. In B. Faulkner et al. (Eds.), *Tourism in the 21st Century* (pp. 3-17). London: Continuum.
5.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2<sup>nd</sup> ed.). London: Sage.
6. 王雙懷 (2000)。曲江風景區的環境變遷。《西北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 30 (6), 533-536。  
Wang, S.-H. (2000). The change of the scenic spot Qujiang.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Edition)*, 30(6), 533-536.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7. 吳肇釗 (1992)。《奪天工：中國園林理論、藝術、營造文集》。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Wu, Z. Z. (1992). *For the art excelling nature: Collected works on Chinese garden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al & Building Press.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8. 周維權 (1990)。《中國古典園林史》。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Zhou, W. Q. (1990).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 garden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9. 和紅星 (2002)。古城西安整體環境的協調與分析。《建築學報》, 2002 (5), 49-51。  
Han, G. X. (2002). Coordination and analysis about Xian City's integrated environment.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02(5), 49-51.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10. 和紅星 (2005)。城市復興在西安的探索與實踐。《建築學報》, 2005 (7), 48-50。  
Han, G. X. (2005).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urban rejuvenation in Xian.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05(7), 48-50.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11. 張松 (2001)。《歷史城市保護學導論：文化遺產和歷史環境保護的一種整體性方法 (第二版)》。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  
Zhang, S. (2008). An introduction to integrated conservation: A way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ic environment (2<sup>nd</sup> ed.). Shanghai: Tong Ji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12. 張錦秋 (2004)。唐韻盛景曲水丹青：長安芙蓉園規劃設計。《建築創作》, 2004 (3), 34-53。  
Zhang, J. (2004). Flourishing landscape of the style of Tang dynasty: Planning design of the lotus garden, Chang'an. *Archicreation*, 2004(3), 34-53.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13. 張錦秋 (2006)。《大唐芙蓉園》。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Zhang, J. (2006). *Tang Lotus Garden*.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al & Building Press.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14. 張錦秋 (2007)。《歷史文化名城中建築創作之我見》。豪商地產網。上網日期：20091130。網址：<http://www.hawsun.com/hsw/wh/view.asp?id=1749>。  
Zhang, J. (2006). *My artistic conception practiced in historic cities*. Retrieved Nov 30, 2009 from <http://www.hawsun.com/hsw/wh/view.asp?id=1749>
15. 張家驥 (1986)。《中國造園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Zhang, J. J. (1986). *On Chinese gardens*.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16. 楊曉曼、段淵古 (2007)。城市文化主題公園景觀營造探析。《安徽農業科學》，35 (12)，3518-3519。  
Yang, X.-M. & Duan, Y. G. (2007). Analysis of the theme parks and landscape design.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35(12), 3518-3519. [in Chinese, semantic translation]

# Historic Cities, Representation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Tourism: A Case Study on Tang Paradise in Xian City, China

Pao-Ning Yi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s, Aletheia University  
ning@mail.au.edu.tw

## Abstract

From the 1980s, China's economic reform went hand in hand with the growing tourism industry and urban development. After the economic growth as a whole, people in China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Meanwhile, to protect historic cities in modern China also implies to make cities more beautiful and convenient for people to live in. Thus, while these historic cities are eager to demonstrate their cultural significance to earn their cultural hegemony and identities, they also become more "modern" cities.

In this essay, a case study on the Tang Paradise, a theme park designed by Architect Zhang, Jinqiu in Xian City demonstrates how Chinese people took advantage of its historic and cultural resource. By manipulating the sign of Tang Dynasty as the strategies for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Xian City earned its economic growth and cultural hegemony in the same time.

**Keywords:** Xi-An, Cultural Tourism,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Hegemony, Tang Paradise.